



理解的命运

殷鼎



理解的命运

解释学初论

殷鼎

研究者丛书

1988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研究者丛书

第 六 种

责任编辑：冬 晓

理 解 的 命 运

LIJIE DE MINGYUN

解释学初论

殷 鼎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07,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定价 2.65元

ISBN 7-108-00074-1/B·29

目 录

第一章 理性的命运	1
1. 引言：理解与人生	1
2. 一个历史的悬案	3
3. 理性的困境	14
4. 理解的一束命题	20
5. 为“先见”作历史辩护	28
6. 理解中的“三向循环”与“单向循环”	31
7. “先见”拓展理解	35
8. “先见”的历史内容	37
第二章 意义危机	49
1. 意义的失落	49
2. 意义的模糊性	52
3. “原意”说的泥淖	58
4. 意境重合的困局	69
5. “死去的意义”	82
6. 意义——一个可能的世界	91
第三章 理解	99
1. 理解与自我理解	99
2. 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	100
3. 理解与解释	102

4. 理解与方法.....	108
5. 理解——历史的征服者?	112
6. 理解的语言性.....	114
7. 理解的形式.....	116
8. 理解的视野.....	121
9. 理解的创发性.....	125
第四章 方法之后	131
1. 方法的危机.....	131
2. 方法论之贫困与哲学解释学.....	132
3. 权威的衰落.....	139
4. 方法凌驾于存在之上	142
5. “解释循环问题”的现代意义	144
6. 历史意义的未决状态	147
第五章 传统在理解中的命运	157
1. 历史意识的错觉	157
2. 思辨哲学与历史主义的通病	162
3. 传统储存在语言中	165
4. 传统与解释.....	167
5. 谁握有传统的生命?	169
第六章 语言的自我遗忘	175
1. 语言中的传统: 一片阴影? 一片生命?	176
2. 语言昭示存在	179
3. 象征与意义的永久性联系.....	181
4. 语言作为系统的谬误	184

5. 语言作为生动的现实	187
6. 变化逻辑	191
7. 结构所失去的	194
第七章 被遗忘的存在	203
1. 存在被遗忘之后	203
2. 谋求克服对“无”的恐惧	204
3. 古典哲学企求什么?	206
4. 经验的生命	212
5. 经验的美感	216
第八章 解释意识的再生	223
1. 转折的前奏	224
2. 哲学的理解	225
3. 施拉依马赫——现代解释学奠基人	226
4. 理解的艺术	228
5. 心理解释与语法解释	229
6. 语言所负载的个人精神生活	230
7. 避免误解的学问	231
8. 笛尔塔与现代解释学	233
9. “生活哲学”	235
10. 理解人生的起点	237
11. 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241
12. 历史意识的萌生	243
13. 人与历史之间的“第三者”	244
14. 历史的内涵	246

第九章 合法的偏见	249
1. 哲学的关切	251
2. “前理解”状态	253
3. “偏见”作为哲学观念	257
4. 两种“先见”	259
5. 境界融合	261
6. 解释境况	264
7. “受历史作用的认识”	266
8. 本体论解释之线索	268
9. 来自内部的挑战	270
第十章 历史在解释中的遭遇	279
1. 现象解释学的先声	281
2. 方法论迷失	283
3. 一种历史与多种解释	286
4. 客观性之误解	291
5. 历史的不完整性	293
6. 原因、动机与意义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	294
7. “我在”的解释学	295
8. “我在”与语言	296
结语 理性的现代课题	301

第一章 理性的命运

1. 引言: 理解与人生

理解对人生负有双重的责任：它使人与生活及文化传统建立起意义联系的同时，彰现出人的自我理解。

由理解酝酿生成的意义，浸透于人生的各个层面——意图、目的、情绪、思想、价值。理解展开的是一个人生存在的精神世界。

人在理解中意识到他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理解同时也拓宽了人生的境界。人生每时每刻都卷入理解，失去理解，人生变为一片无意义的阴影。因而，理解是构成人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与方式。

理解借助语言文字，表达流露，成为解释。解释基于理解。人在生活中解释人生，人又生活在解释与理解活动之中。解释与理解参与到生活的每一方面。

所有的理解与解释行为，都是公开或隐蔽地在理解历史、文化、传统或现实中去谋求理解和解释人自身，理解因而同时是人的自我理解。

在解释与理解历史中，人展开了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也使传统获得了进入现代的途径。

传统不是一具等待解剖的僵尸。凡是理解的视野所能触及到的历史文化,就已经意味着具有潜在的生命。传统的命运,不在它自身掌握之中。传统的前途,握在我们这些解释者手中。传统为它的新生付出的代价,是不断接受新的理解与解释。

传统也不是一丛栖息在过去的暗影,随着我们理解的光亮增强而消逝。我们生活在语言中,能够保存传统的是语言,我们因而已生活在传统中。无论我们是否自觉意识到或承认传统已在我们之中,在解释传统之前,我们必须置身于某一文化传统中,并用语言去解释理解传统。这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面临四种关系,并时时刻刻处在这四种关系之中:

他必降生并生活于某一传统之中,在这种存在的境况中开始解释理解传统。

他必须接受某一文化传统的语言,并由语言来理解和解释传统。

他接受并理解语言的同时,传统已通过语言进入了他的生活与存在。

他的理解和解释之所以可能,是他已在传统中存在,拥有负载着文化传统的语言,并怀着对过去的疑问,对现实的困惑,和对未来的期望。

这四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经纬出入的理解与解释活动:在个人的存在境况中,理解在传统中并通过传统中的语言而发生,人的理解永远是对传统和自身的理解。

理解传统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由传统而来,我们对传统的责任和兴趣远不止于这一点。解释传统的动机,根植在人希冀通过传统来理解自身的要求。我们对传统的疑问、兴趣、责难、争

执，都是由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迷惘困惑与期望中导引出来。传统实际上是“现在”的传统，而不是已逝的过去。每一时代都有它对未来的期望，凡是历史中有能力进入这种期望内的一切，便是这个时代所拥有的传统。这个传统并非就是传统的本来面目，也无必要非是传统的本来面目，更不可能是解释复原出的传统的本来面目。

传统能够成为每一时代的传统，能对一代代人发生不同的意义，秘密在于传统允许每一时代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延伸它，犹如凤凰涅槃后的再生。

2. 一个历史的悬案

哲学解释学是后起的当代哲学，^① 它的晚出给了我们以对以往哲学的理解理论进行反省的机会。同时，这种历史的回顾，也对揭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解”观念作了理论上的铺垫。这样，当哲学解释学由一个新的视野中展开理解与人生的关系时，我们也就不会在哲学解释学与以往的哲学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上，产生一种突兀的断裂感。

理解卷入了人生的各个层面：理解与理性、理解与传统、理解与直觉、理解与语言，以及理解与人生意义、价值、信念。传统哲学把人的理解所面临的问题，规定为如何或怎样去实现理解的认知取向。而在当代哲学解释学中，理解自身首先形成了哲学问题。

如同思潮在历史中崛起衰落，哲学对理解的认识也在历史

中演进嬗变。由柏拉图哲学奠定的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哲学所致力进取的主要思辨走向。思辨哲学对认知主体与客体的分别，限定了理解仅能被视作为认知主体的属性及活动方式。换言之，理解是理性认知的形式和结果。这样，理解不仅沦为理性的附庸，也成为达到某种认识的工具。在面对“理解自身是什么”这样一个关系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时，思辨哲学倾向于把理解限定为理性或主体的认知活动，而理解的前提，又赖于理性自身具有的能力。人，成为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理性的动物”。

这种对理解所作的单方面的限定，曾引起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派别的反应，同时也使宗教在解决信仰与理解、体验与觉悟的关系上，遭遇到重重困难。

首先是“生命”哲学对体验(experience)的推重，要求用直觉的体悟去理解生活，去理解和规定“理解”。^②理解在“生命”哲学中，不再是理性主义运用观念抽象分析经验的结果，或是逻辑推导的结论。理解在体验中，成为直觉对生活经验的解悟。

神秘主义也倾向把“理解”限定在与理性对立的直觉体悟的范围内。这种“理解”，不仅可在语言之外进行，甚至根本排斥语言负载表现这种理解的可能性。理解成为个人与宇宙产生意义关系中的非语言和非理性的精神状态。^③

无论是在理性主义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哲学中，理解由于被限定为或是理性的表现或是直觉解悟力的睿智，一直被掩映在关于理性和直觉的讨论之下，成为这些观念的附庸，在传统哲学中没有取得它本来应有的包容兼蓄理性、体验、直觉、以及人自身的历史存在的突出地位。倒是解释学自己的传统，一直全神贯注于如何实现理解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解释必须以理解

作为基础，理解才使解释成为可能。无论是解释古代典籍、历史和文化传统，或是解释自然现象和物理变化，解释总是从某种程度的理解开始，而解释的过程又推进了理解，扩大了生活的范围。另一方面，传统解释学又一直自视为是研究达到正确理解之方法的学问。施拉依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曾把解释学一言而蔽之为“理解的艺术”。^④这种艺术表现为在解释典籍、文化、历史时，解释者能自觉地运用恰当的理论与方法，避免误解和曲解，通过正确的理解完整地再现出作品的意蕴，或把握住历史的真理，在这种意义上，传统解释学又把自身界说为“防止错误理解的方法”。^⑤

当代的哲学解释学与传统解释学之间的歧异，首当其冲的是对“理解”的分歧。

从整个西方解释学的发展看，解释学对理解的认识经历过三次重大的转折，而每一次转折，都改变了解释学致力的方向，以及解释的范围。

解释学最初对理解的关心，只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经典解释范围内。解释学原本是《圣经》研究的一个方法论分支，或说是解释圣典的技巧。正象解释学的希腊文字源Hermēneu (ein)〔动词〕或 Hermēneia〔名词〕所表达的，含有三种意思：一是表达；二是解释；三是翻译。但解释学(Hermeneutics)要表达什么，解释什么，翻译什么？

原来在古希腊传说中，记载有一位带足翼的信使神——赫默斯(Hermes)，希腊人信奉他发明了语言和书写，人类因此有了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工具。赫默斯(Hermes)作为往来于众神与人间的信使神，能够把超越了人的理解的神旨，转换成人可以

理解的形式——人的语言。换言之，赫默斯能把人不可理解之物，变为可理解之物。^⑥

解释学(Hermeneutics)最初即借用此意，指理解为把《圣经》等圣典中蕴含的上帝的意图，通过语言的解释和注释，揭示昭明的过程和方法。这种宗教信仰上的解释目的，决定了解释的取向是如何发现和理解那已假定蕴藏在圣典中的上帝的意图(intention)。在这种取向中，理解的对象，即神的意图，被视作独立存在于理解之先，理解之外的东西。理解的目的是要发现并再现它的对象的真实意图。理解应当调动起一切认识手段，包括文字考证，句法分析，了解意义的背景(context)等方法，去实现在圣典中发现作品真意的目的。圣经解释学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格外关心圣典文字背后的“意图”或“原意”(the original intention(of God))，文字的考证和诠释也因此发达起来，促进了文字学的长足发展。

解释学从圣经研究的方法与分支，转变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中实现的。文艺复兴促发的对古希腊典籍和文明的兴趣，使如何解释与理解古代典籍作品的问题，逸出了解释圣典的范围，扩大到对整个古代文化的解释和理解上。这不仅仅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要采用某些解释圣经的解释学方法，应用到对世俗的典籍理解中。更重要的，文艺复兴中蓬勃生长起的反宗教意识与理性的高扬，出现了把《圣经》和宗教圣典作为文化和历史现象来研究对待的要求，主张解释理解世俗古典作品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解释理解宗教圣典。宗教圣典并不享有独特的理解方式。这种把圣典世俗化的解释取向，在政治上，显然是对圣典权威与神圣性的蔑视，

同时也是对教会垄断圣经解释权和解释标准的挑战。在认识论上,这种新的解释取向使解释学不再局限在圣经理解的狭小天地里,它给解释学洞开了作为整个人文科学一般方法论之门,成为给人文科学各学科中,如史学,文学批评,法学,哲学等,如何实现理解历史、作品、法律、存在提供方法论的学科。

促成解释学这一转变的思想家中,德国的施拉依马赫是最有力的推动者。“理解”这一观念,是经他的手,被置放为整个解释学理论的基石。对施拉依马赫来说,理解不再是圣经解释学中“意图”的破译术,人类存在自身即是理解的进程。理解的形成需要三个因素的汇合。其一是理解必须要在语言的联系中进行。宗教的“冥入”及其它形式的非语言悟解被排除在理解之外。其二是理解只能在理解者全部经历的背景上才得以发生。前者是指理解的语义结构,后者是指理解的心理状态。理解是在分析语义的同时,进行心理上转换或成功地进入他人意境。解释学的任务,根据施拉依马赫的“理解”观念,是如何在语言分析和心理转换的统一中,把解释对象(作品、历史、文化传统等)自身所具有的意蕴(meaning)再现出来。关于理解是否可能再把作品或历史中原有的意蕴复原再现出来,是本书将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哲学解释学对传统认识论作出的最有力的挑战。我们将把这一问题在有关专节中详尽地展开讨论。

施拉依马赫对促成解释学注重解释者从心理上向历史作品中原作者心境与意图的转换,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他给解释学中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萌生,埋下了种子。他要求解释者不仅注意作品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同时也

要考虑到解释者自己的历史背景及对语言的理解，在实现从自己的心境进入他人或古人的心境时，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避免曲解和误解作品的真意。另一方面，施拉依马赫也在解释学中开启了一个非历史主义的解释取向，即相信解释者只要克服了语言理解和个人由经历而来的心理的特殊形态后，便能够在历史的一个特定时刻（解释者理解作品或历史之时），克服解释者自身由他在特定历史时刻带来的历史局限，自由地从他个人的心境中再现出任何历史时代中他人的心境（意图）。

解释学在施拉依马赫之后所取的解释历史和典籍的方向，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种解释历史和典籍的取向，是把理解历史或典籍的过程，视作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前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过程。正象施拉依马赫一位同代的思想家阿斯特(Ast)所表述的，“理解与解释历史是对已失去的进行重建”。^⑦

这种以理解重建历史的解释取向，本身具有反历史的性格。因为它假定解释者在理解历史时，可以有一种中立的、不受历史限制的认知意识，可以把解释者带入以往的历史中，重新在精神上体会和复制出已逝去的过去。它要站在历史之上鸟瞰历史，而历史中的人却不能在历史中给意识找到这种鸟瞰历史的超越地位。

十八、九世纪在德国兴起的历史意识或历史主义，引起了解释学重心的又一次转变。这次转变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直接的精神上的联系，尤其与对理性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生活”的观念曾在德国唯心主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维护情感的炽热澎湃，反感理性的严峻冷酷，强调生命的

整体活力，直接体验，不满理性无限度地扩张、压抑住生命的蓬勃向上。

传统解释学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里程碑式的思想巨擘，威廉·笛尔塔（Willelm Dilthey，一译狄尔泰，1833—1911）。这位德国思想家给解释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并给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解意识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笛尔塔由两个观念入手，使解释学的理解取向为之骤然一变。这两个观念在今天看来，相当寻常，似乎并无石破天惊之新意，而实际上，他所输入给解释学的思想血液，对解释学富有生命地活跃于当代，有着起死回生、扭转乾坤之力。继他之后，解释学无可挽回地疏远了它从前执著的解释取向，转而关注如何使由解释历史、典籍乃至生活所得到的历史知识，成为人的自我知识的形式。研究历史不是在研究一个已逝去的对象，而是在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

笛尔塔首先着手的是经验（experience）与人生的关系。经验对历史乃至整个人生，永远保持着经久的活力与意义。经验与人的内心生活有一种观念无法分离的直接体味的沟通。经验先于分析，先于理解，先于价值判断。如果说，没有哲学抽象和反省的人生，仍旧是一种人生，而没有经验的人生则只有死亡。

在解释历史、文化甚至小至一部作品时，我们面对的是过去的人们已经体验过的、遗留在史料和史迹中的生活。这些已不复存在的生活，却不应当象理性主义对历史所取的态度，只成为理性解剖的已经死的尸体。这些生活经验中，包容着一种对人类对永久意义的生命内涵，解释与理解永远无法穷尽枯竭经验的这种生命内涵，历史由此而永远对我们保持着活力和意义。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意识所依赖的并不是象康德理性主义所说的相对于理性的感觉(sensation or Empfindung)，而是生活得以展开表现的“经验”或“体验”。^⑧生活表达在体验中。在人生中，经验不是随时即逝的飘浮在生命表层的一些泡沫，自身空洞无实。经验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它又保存在历史中，由历史记忆着，随时影响着个人对整个人生的理解与解释。一个人越是能够体验更多的过去，他越是能更多地从他的解释和理解中，释放出历史经验的生气来。

经验是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的基础。笛尔塔在经验与历史乃至整个人生的直接联系中，看到了解释学的新出路。解释学不应再致力于设法如何摆脱个人经验，以求达到一种能超越经验的“客观”的历史知识或真理，而这种企图正是超历史的。恰恰相反，解释学应回到经验中，在经验中，在这些人的内心生活的表现中，达到对生活 and 历史的客观地理解。笛尔塔在这里使用的“客观”一词，与理性主义通常使用的含义不同。理性主义向往的“客观”，是指在人类共同理性衡量下的独立于任何个人心灵的普遍认识或原则。这些原则和认识，不仅仅是超越个人的，也是不受历史时空的局限，而由人类的理性来发现和保障这些原则的客观性。

笛尔塔标举出一种蕴含在人类经验中的客观性。在生活所表现出的具体的形式中，即经验中，有一种存在于个人之间的普遍性(Gemeinsamkeit)，笛尔塔称它为“客观之心”。^⑨这种“客观之心”实际上假定历史中有一共同人性贯穿于人生经验中，在此共同人性上，理解与解释成为可能。历史知识与真理的客观性，也是由这种“客观之心”的共同认识，而得到了保证。